

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兴衰记

农伟雄

一位蒙古族穷苦农家的孩子，先是出家当喇嘛，后来呼拉拉揭竿而起，再后来成为伪蒙军总司令，独霸一方，他的人生际遇起伏跌宕，本文有真实记载。

“三喇嘛”的升迁

内蒙的土默特右旗，在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的交汇处，是一片半农半牧的沃土，河的左岸连绵的半丘陵地带，有一个近百户的村子——土默特右旗古力古大庙。1892年7月11日夜晚，一户早年闯关东的后代李罗锅又喜添一子，排行老三，取名李义。

小李义长得机灵好动，看来他并不是李罗锅

所期望的那种“守土当家”的“坯子”。正好这时大庙要出家人，李罗锅便将老三送到大庙去了。小李义取名“三喇嘛”，时年12岁。

大庙离家不远，不安分的三喇嘛常在夜间跑回家来。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胡匪和练兵你来我往，李家正好在通往开鲁的大路边，一年到头不断有扛枪骑马的人打尖住店。三喇嘛和这些兵痞混熟了，便生出了耍刀弄枪的嗜好来。1918年冬的一夜里，驻扎的县民团丢了两杆枪，团总急得集合队伍训话，这时，李义斜背着枪，手提一只野羊进来了，一场虚惊化解了。春天，三喇嘛便逃出爱根庙，到县民团“扛枪”了。

李义为人豪爽，喜于交际言谈，团总分配他当马警，经常骑马下乡，和胡匪头子打交道。没过半年，蒙汉地区的“匪杆子”全玉荣（荣三点）和白风翔（白三阎王）都同他很熟。这些人手下胡拉拉的一帮人马，独霸一方。县长绅士都得恭敬从命。李义对此很看重，他也想要建立自己的“杆子”，手下有那么一批前呼后拥的弟兄，同他们“争霸天下”。这样他便离开县民团自己“干”起来了。两年功夫下来，果然纠合了800多人的队伍，在热辽边境开鲁地区打开了一片天下。不久，热河游击司令张连同看到这位“李杆子”颇有声势，于是收编为该部连长。双方宣誓结盟，从此李义改名为李守信。1922年春，内蒙巴布扎布余党进犯开鲁，张连

李守信（右）与德王（1942年）

同派李守信部反击得胜,因此李又升任营长,张连同还送他“张子忠”的表号,表彰他忠心耿耿。

1924年,直、奉军阀的两次混战为悍勇猛的李守信进一步提供了机会: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所带的营偷袭奉军二十八师汲金纯部成功,缴获德国野炮8门,机关枪40多挺,李守信名声大震。第二次直军惨败,张连同的热河游击师改投奉军,所部改名为东北骑兵第十七旅,李守信升任该旅三十四团团团长,他趁机收编了过去自己的“杆子”1000余人,因此,三十四团变成该旅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团队,成为热辽吉边区八、九个县的绅商地主,县民团的保护人和太上皇,因而也得到了入侵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的青睐。

投靠关东军

1933年2月,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占了山海关,热河是他们下一步的目标。3月,一架日本飞机低空飞临开鲁侦察,被李守信团用机枪击落,俘获机上人员4人,机枪2挺,电台2部。万没想到这个事件倒成了李守信投靠关东军的机缘。

日机被击落之后,开鲁地区战局平静,关东军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3天过后,奉军骑兵十七旅旅长崔兴武才接到日军的函电,指名要李守信机上人员到通辽关东军特务机关换取枪支和子弹。李守信和开鲁县长抱着试探的心情赶到通辽,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说他不能作主,派出专机把李守信送到新京(长春)关东军总部。当晚,关东军总司令菱刈大将和参谋长小矶出面接待,菱刈称赞李守信是“很勇敢的蒙古人,我们很佩服你们三十四团,愿意和你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小矶接着说:“关东军不相信崔旅长(指崔兴武),你是蒙古人,所以找你谈。”“飞机上那几个人,送不送还,都没有关系,我们日本人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已经牺牲了不少人,以后还会有更大的牺牲,我们不在乎飞机上这几个人。”席间,频频举杯,劝说李守信同关东军携手,复兴蒙古民族。一心想扩大势力,坐霸热河、内蒙古天下的李守信听后深感意外,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时机。

李守信急急赶回开鲁,第二天不但带着飞机上的4人,而且连机关枪,电台等全部送回(飞机事后已被焚)。对于李守信的忠诚,小矶非常高兴,他当场说,“关东军送三十四团20万发子弹,手提机枪20挺,步机50支,到奉天兵工厂去领,另外送你3万元“诚实费”。最后握着李守信的手说:“关东军为你李团长才这

么做,要换个崔兴武来,我一发子弹都不会给。”

早在1928年,当时还是直军营长的李守信率部队驻扎爱根庙地区,那时日本间谍便通过活佛萨布楞来拉拢。萨布楞将庙中最好的房子让出做李守信的办公室,双方结拜为把兄弟,他对李守信说:“我是出家人,带不动队伍,你是咱热河有出息的蒙古人,如果想成大事,我愿将最好的武器交给你。”萨布楞还告诉李守信,庙中藏有日本送来的步枪5000多枝,还说日本人“以后随时可以给机关枪大炮。”这位活佛还拿出一张“联络照”,这是日本大正天皇夫妇的照片,说凭这张“联络照”,可以免费坐从通辽到旅顺的头等火车,免费供给饭菜。只是当时李守信人少枪少,还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已今非昔比,有着关东军明确的支持,他当着三十四团团团长而望着骑兵十七旅旅长的位置,于是便明目张胆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起蒙奸来了。

开门迎敌

李守信在新京的“蜜月”旅行中突然被叫到通辽接受命令。通辽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告诉他,关东军昨夜已经出发,正在通往开鲁的路上,要他马上赶回开鲁,告诉十七旅不得发生误会,开放城门让皇军进入开鲁城。

崔兴武也是个“明白人”,当他侦得日军铃木师团往开鲁方向出发的情报之后,一夜间便率部西逃林西。李守信看到空城好高兴,他同汉奸县长一起,打出了欢迎皇军进城的标语,并在自己家中摆下酒席,准备为铃木司令洗尘。结果狡猾的铃木不敢来,反而在自己的办公室,用日本的罐头招待李守信等人。喝得醉醺醺的李守信拍着胸脯说:“铃木将军,今后十七旅听从你的调动!”

十七旅逃到林西之后,旅长崔兴武明知日本人对自己不信任,可是在战与和之间又犹豫不决,最后决定采取“不抵抗”政策——离开部队回家了事。离队前委托李守信代行旅长之职,李守信的目的便顺利达到了。他命令部队原地驻防,维持治安,同进入林西的关东军小柳匀部“和平相处”。

李守信的“顺利接班”也使关东军大感欣慰。通辽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对关东军总部发去电报说:“从此通辽和开鲁已经连成一片了。”李守信在随即写给关东军的计划中宣布:“皇军的命令适合于十七旅的行动。”

一个星期之后,林西的小柳匀部要开往赤峰,李守信建议从乌田城附近填田桥过去赤峰,“这是最安全

的路线”。无奈军机大事小柳匀不敢轻信，执意从自己所选择的路线行进。结果2000多人马辎重武器全部陷入河里，300多里路程走了3天3夜才赶到赤峰。过后田中玖派汽车把李守信接到赤峰，极力夸赞李守信的忠诚。他说：“你们蒙古人的心真诚。小柳匀不听你的话，部队装备全部陷到河中，花了很大力气才弄上来，你若在半点不忠，派出一个连队去包围，小柳匀的旅团就完蛋了。”“我奉关东军总部之命，对你表示感谢和信任，并犒赏你1.7万元作为军事机密费。”

1933年4月，李守信的奉军骑兵独立十七旅被改编为热河游击独立师，委任李守信为司令员，纳入了关东军的战斗序列。

关东军在游击师中派有“顾问团”20人，训练、监督该师的行动。至此，李守信便正式打起太阳旗，在关东军的指挥下从事叛国活动。

进攻多伦

李守信穿着皇军的将校服，右手举着军刀，面对以关东军浅田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宣誓：效忠天皇，进攻多伦。

这是1933年5月，热河游击师经过15天的集训之后，关东军便将他们送上察北战场——多伦。

多伦位于察北、晋西、内蒙古的交汇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中国军队正集中全力进行长城抗战，日军派遣李守信师进攻多伦，就等于给中国军队的背后插上一刀。

为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支持中国军队的长城抗战，在李守信占领了多伦之后，以冯玉祥为首组织的“全国抗日大同盟”万余战士在张家口示威游行，并派人到多伦找到李守信劝告他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加入“抗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李守信也深知其中利害，他想顺势做点姿态，既不损害目前的利益，也为将来留一条后路，想定了之后，他同冯玉祥派出的人员达成了“撤出多伦城”的协议。

1933年7月7日，冯玉祥率领“抗盟”几千人的大队伍，浩浩荡荡直取多伦。多伦城东、西、南三面被层层围困，3天3夜枪声不断。接着双方便处于攻的不能取，守的无力反击的胶和状态。李守信部已到“弹尽粮绝”的严重地步。日本总顾问浅田问还有什么好办法可利用？李守信回答只有等待城破拼大刀片。这时浅田害怕军情不稳，部队叛变，更怕随军的20多名日本顾问成为刀下鬼。他自己首先向承德方向求援，但因连日

大雨飞机不能起飞，地面援军又不能解燃眉之急，便自然而然地上了李守信设下的圈套。下令热河游击撤出多伦。于是待机行动的冯玉祥“抗盟”万余之众便冲东前进，“占领”了多伦城。李守信师则边战边退，按照浅田的意图后撤300里，当撤至目的地时，关东军称他们是“英勇后撤”。

让出多伦城使李守信享受了多方的好处，当他的部队全部到位后，他的“忠诚”进一步得到确认，承德特务机关将他接去疗养12天，补发给50万发子弹，500支步枪，3万元撤退费。李守信枪弹初步得到满足。不料刚过15天，日军又命令他夺回多伦。

李守信和“抗盟”达成的协议是“借地”20天，此时离借地期限还有5天，他谎称非吉日推迟1天出发，途中又故意怠慢1天，这样赶到多伦城下正好是“借地”期满。当晚多伦城下又是一场“死战”，李守信亲自领着第一支队从北门进攻，第二、三支队分别从东、西两门攻击，而让出南门让“抗盟”大队人员离去。多伦又被“夺”回了，战报飞到日本特务机关那里，李守信的“英雄史”又添上了一大笔。而冯玉祥的“抗盟”“占领”多伦的时候，全国士气也为此大振。

1933年9月，日本关东军总部又下达命令：将热河游击师扩编为察东警备军，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员。部队增加了一个通讯队，一个宪兵队，一个山炮队，各种武器，弹药源源运来，李守信感到他“终于像个将军了”。他马上赶到长春去谢委。小矶握着他的手说：“你是内蒙古的英雄，你的明白，恢复内蒙古的地盘，这是你一生的任务。”

“蒙古军总司令”不是梦

李守信自视为将军，可是在关东军那里只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被死死地定在棋盘上。关东军开始称他是“蒙古英雄”，他的任务是“复兴蒙古地盘”。

日本关东军的目的，是将热河、察东、绥东、晋西北的蒙古地区，从传统的汉族政权中分离出来，和内蒙古成立统一的自治政府。而李守信，早已做上了“蒙古军总司令”的好梦，他正在拼死拼活地去实现，去追求。1935年冬，他以察东警备军司令的身份率部离开多伦，进犯察东，很快占领了宝昌、康保、商都等6县和附近八旗，于12月31日占领察北重镇张北。这样，成立伪蒙政权的时机成熟了。

李守信占领张北之后，便活动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统领各盟，旗伪蒙政权。他的设想没有得到关东军

的支持。1936年4月，绥东也被占领了，李守信又提出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的主张。但是，在关东军的导演下，成立了第一个内蒙军政府，军政府中设内蒙军，由内蒙德王穆楚克栋晋鲁（德王）任政府主席和内蒙军总司令，李守信任副主席和副司令，军权旁落，他的目的没有实现。

从组织上来说，内蒙军是李守信的察东警备军转化而来的，建制，人员都是他的部下；而德王从来未带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李守信表面上服从安排，然而却通过部队中的亲信拒绝执行德王的命令，以显示自己的不满。为安抚，关东军派人来说：“军职虽然这样安排，但实权仍在你手中，总司令只是一张虚牌而已”。尽管这样说，可德王一上任就检阅部队，要各师单独宣誓，向他效忠，这是李守信不能接受的。他和部队滚过来这么多年，也没搞过这种检阅。李守信通知“以准备不足”而拒绝向德王效忠检阅。刚刚组建就发生了不和，关东军本想以此安排来满足德王一再提出的“主权国家”的要求，也想压一压李守信膨胀扩张的心理，但生怕酿成祸乱，于是在占领绥远和张家口之后，1937年8月，内蒙军政府改为内蒙联盟政府，趁机将蒙古军总司令一职授李守信。这样，李守信的“蒙军总司令”之梦终成现实。

李守信和德王双双各自成为内蒙军、政的头面人物。由于德王强烈的“主权国家”的追求，关东军便通过李守信来协调，将伪蒙作为地方自治政权，安插在即将出台的“汪伪政权”之中。1940年1月，汪精卫在青岛召集“全国”会议，讨论“统一建国计划”。德王坚持内蒙以一个“独立国家”的代表参加，否则不参加这个会。日本张家口特务机关长要李守信去说服，并代表蒙疆自治政府（1939年底由内蒙联盟自治政府改名而来）与会。会上李守信和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汉奸头目分别会晤，达成默契，最后签署“双边协议”。协议根据日本首相近卫关于“善邦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承认“新中央（汪伪）为继承中国法统的正规政府，而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是地方政权。”汪伪则承认内蒙古地方政府“高度自治”。李守信同日本的侵略政策密切配合，使得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按时登台。

1944年，随着东南亚战场的吃紧，大批华北日军被调往中国南战场。为了稳固后方，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北平召集华北各地伪军头目商讨区域联防问题。伪军头目庞炳勋、孙殿英、孙岗峰、李守信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李守信认为，由于日军南调，傅作义的部队一定由西蒙后套出发攻击大同，包头或后和（即呼

和浩特）。冈村宁次对此相当重视，并要李守信提前回防，李守信对冈村宁次说：“我以内蒙军总司令的名义保证：蒙古军能阻击傅作义部的东进，保护华北战场平安无事”。好一个内蒙军总司令！他已将保护日本侵略者的生存当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

弃日投蒋 再走绝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张家口的李守信内蒙古军司令部门前，第二天出现了两位带着五角星帽徽的军人，他们带着八路军总部的公函，要求会见李守信。根据日本军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根本博关于“内蒙军只向国民党投降”的指示，李守信拒绝会见八路军代表，并且下达了“见到八路军要坚决反击”的命令。

随着日军大批人员向平津方向后撤，李守信也将家属、家财运回北平。他将军粮200多袋面粉，10万两军饷兑换的大烟，还有一大箱金条，连人带物，一共装了满满4大卡车，4辆小车，运回他在北平东城什锦花园的家。

蒋介石对各地伪军采用收编的政策，还在日本投降前夕，便将李守信部改为第十路军，在从张家口撤退回北平的火车上，有中统人员找到他，宣布蒋介石关于李守信任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令。此前不久，蒋介石还宣布了“对伪蒙政权的蒙古族人员既往不咎”的命令。李守信和德王从而转投蒋介石。回到北平不久（即9月初），他们便坐上胡宗南的飞机去重庆见蒋介石。

作为伪蒙总司令，李守信现在手下是无一兵一卒可调遣，他的部队已接受傅作义的改编，而傅作义又不喜欢他回军中，所以，蒋介石的“第十路军总司令”只不过是空牌而已。当他见到李守信便命令李“马上回部队去”。李守信只好连连答应“是是是”。可心中却充满了外人所不知的酸甜苦辣。

由于重庆交通堵塞，李守信迟迟不能回北平，蒋又亲自出现给他解决飞机票。李守信于1946年初回到北平。

在北平，他从李宗仁的口气中又得知傅作义不喜欢他回绥蒙。看来，只好另外“趟路子”了。他从大批烟土中选了上好的两块给北平行营办公室送去，第二天李宗仁的秘书便告诉他：“可以请中央改派出关整理队伍”。这是一个新的信息。接着他又给中统北平工作组马汉三送了一大块。这时正好戴笠飞来北平，李守信不敢以烟土去贿赂，便送去了一桌酒席的礼券，戴笠收

下给手下人员吃了。戴当时指示李守信到锦州,找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安排一切”,并要马汉三拨出电台30部和4位技术人员随同前往。李守信到锦州之后,熊指示他去热辽蒙边境组织“人民自卫军”,拨出30万元当作筹备费用。这样李守信又回到原来的“老窝”,开始了他当年“拉杆子”的活动。

李守信很快找到了当年的一些“兄弟”,只3个月的功夫,一支5000人的队伍便招纳起来了,李守信在阜新当上了热辽蒙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为了嘉奖,蒋介石又专电委任李为热河省保安副司令,随之,东北行营又发表李为热、蒙各旗“联防司令”。

1946年12月的一天夜里,李守信的自卫军在他的发迹之地开鲁县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双方激战一昼夜之后,开鲁县城被攻破,“人民自卫军”溃不成军。残部逃入通辽,李守信只身跳入一口枯井内藏身,天亮时又换上一身破烂衣服,混入一农村扛尸队中才得以逃出开鲁县城。这使他深深领教了解放军的强大战斗力。

1947年5月,也仅仅过了半年的时间,李守信的热、辽、蒙边境的“人民自卫军”便被改编,初称骑兵第三军,不到两个月又降格为骑兵一旅,军权的不断被削使李守信丧失了信心。这时正好陈诚接替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李守信趁机提出“身体不佳”不能履行军职,于1947年10月29日离开东北回北平。这正好是他“出关整理队伍”1周年。

国民党军事上的不断失败,使李守信度日如年。他想以60万美元高价抛售北平的房产,远逃了事,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又迟迟找不到买主,他只好整日闷闷不乐,不是卧床抽烟,就是睡大觉,和外界几乎断绝往来。至1948年10月,北平四周已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于是他便决心弃家携眷南逃,以7条黄金的昂贵价格包租一架从北平去上海的飞机,于1948年10月28日由北平飞往上海。

两个月之后,即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又派出专机,将内蒙德王等从北平接回南京。蒋介石很快接见李守信和德王,指示他们去西蒙定远营组织“蒙古自治委员会”,并每人分别奖励法币100万元。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接见他们。

德王很快从南京飞往广州,遵从蒋介石之命去西蒙。而李守信此时却忧心忡忡,他的首要任务是遣送眷眷去台湾,将家属安排好之后再作决定。李守信一家大小12口经过4天4夜的航行,从上海到了台北。由于人满为患,租房金贵,他用5条黄金买下了两间房子,这样便在台北安下了家。

对于去西蒙筹建内蒙自治委员会,李守信因为没有多大把握,正在犹豫之时,1949年6月初,德王派人来台北邀请他“出山”。这样李守信便从台北去广州,转宁夏,在宁夏组组旧部2000多人,开赴定远营作最后的挣扎。

在黄河东岸的陶乐,李守信又从南逃的马鸿逵手中,接过了陕、甘、宁“三边游击司令”的职务。由于兰州被围,马鸿逵南逃时将残部拼凑的杂牌军又给李守信手中增添了人马。正好这时蒋介石从台湾发来电讯:命令德王和李守信退入阿拉善左旗大沙漠,准备反攻的力量。

李守信带着队伍终于到达定远营,于是在1949年8月,“蒙古自治政府”终于成立了。德王和李守信分别担任军、政首脑。可是随着宁夏银川市即将解放,定远也将不保,他们只好执行蒋介石“退入沙漠”的计划。他们朝着西北方向大沙漠白音图呼庙前进。由于风沙遮天蔽日,走一天路也找不到一滴水,白天风沙漫天,夜里寒风刺骨,一路上1000多人的队伍已经走失一大半,战马全部渴死,只剩下几百头骆驼,他们到达白音图呼庙时已经溃不成军。

李守信等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西北已大部分解放,他们的目标只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前进。他事先也作了估计:即使反攻不成,退入外蒙,同一个民族兄弟,他们不会被当成战犯遣回。于是继续向拐子地区前进,这里离边境只有100多公里了。可是由于饮水和粮食缺乏,一路上只有杀骆驼以度日,最后100多头骆驼也只剩下20头了。正在此刻,前方联络人员带来了蒙方人员口信,蒙古政府请德王前往乌兰巴托会谈。

李守信等在中蒙边境20公里处驻扎下来,可是20多天过去了,德王渺无消息。这期间,玉门解放军派人来找李守信,劝他向人民投诚,还送他和德王每人一条香烟;内蒙古的乌兰夫也派人来接洽。可是李守信一概以“德王不在”为托词加以拒绝。

1950年1月,蒙古边防终于转来德王的信,指示李守信等6名“内蒙自治委员会”高级官员前往边境谈判。行前李守信召集排长以上人员会议布置后事,便带着两名翻译前往边境。越过边境后等了10多天,才接到德王的电报,说会谈改在乌兰巴托进行。此时,李守信心中不安起来,此去是祸是福他心中没底。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行人到达乌兰巴托的当天晚上,等待他们的是冷冰冰的手铐脚镣。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已经为李守信等准备好了罪状材料,当场宣读之后便将他投入牢狱。那是1950年2月27日。

拐杖老人

李守信最想避免的事终于在1950年9月20日发生了，这一天，他被宣布引渡回国。他走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内务部的监狱，被塞进一个闷罐车内，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他是罪大恶极的伪蒙二号战犯，过去手下有10多万军队的蒙古军总司令，现在却象笼中的一只小鸟。他最怕的是被公审，背上插着亡命牌子，游过南大街闹市，然后解往美人桥刑场。这个情景像魔鬼一样和他相随。所以，从跨进蒙古国内务部的监狱之日起，他就苦苦哀求不要将他引渡回国。此时此刻，森严的牢狱大门每一声“哐”的响声，都会引发他一阵心惊肉跳。

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他的牙床肿起来了，接着所有的牙齿都松动了，疼痛使他不得安宁。他自己找来一根麻绳，一夜之间一颗颗用绳子拴着拔下来了，满嘴流血不止。政府把他抬出监狱，送上病床。消肿之后，又为他镶上了满嘴“金牙”。当他出院时，他感到精神突然比以前舒坦多了。

他最害怕的事始终没有发生，年复一年在高墙内学习、劳动、提审、写材料。20几年下来，他写了几百万字，写成了一大部伪蒙政权的历史。牙病好了，战犯们的生活也一天天好了起来，但他的左脖子麻木日益严重，年轻时代充当胡匪马贼，风餐露宿，老来进了监狱，现在都一齐报应了。政府为他还请了中医针灸，一治就是3年，无奈年事已高无法根治。

1964年12月，李守信被宣布特赦。当他脱下一身战犯制服，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来到呼和浩特落户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他成了江南馆胡同唯一的拄杖老人。这里原是清朝绥远城将军衙门浙江籍红笔师爷的住家胡同。这些江南书香门第及土著满人的后代们都很讲究礼节，孩子们看了他都甜甜地称为“拄杖爷爷”。

特赦后的李守信，被安排在内蒙古文史馆担任馆员。政府为他专修了一座有300平方米的独院，院中有北房3间，南屋3间，客厅，卧室，书房，厨房，厕所，杂间一应俱全。院内空地上种了花柳松柏，四季绿叶红花，十分雅致。李守信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每天早上6时早起打扫庭院，吃过早点便乘公共汽车去上班，中午在新城“东风园”就餐。人们看到一个老年人拄着拐杖排队吃饭时，服务员便主动走过来为他端饭端菜。

李守信前后有妻妾共5人，大太太是原配的蒙古族夫人；二太太是陪嫁到土默特右旗王爷府的满族姑娘；三太太是热河承德的妓女；四太太是河北梆子名士中角；五太太是北京一位女大学生。他由大陆带到台湾去的是大太太、二太太和大太太所生的两个儿子。其他3个都被他先后遣散了。所以当他又获新生之后，人们看到他一个人孑然一身，都劝他“续弦”；可这位瘸腿老人却风趣地回答：“像我这样的人，好的寡妇自然不会找来，找我的人一定别有企图，为何自己不自由自在地生活，非要找一位管家婆对自己实行“专政”呢，所以政府只好请一位老人，为他挑水做饭，料理家务，和他在一起生活。

李守信十分感谢政府为他提供的一切，每当想起过去，总是忏悔不已。现在他既要颐养天年，更要面壁思过。他虽然不能提笔写东西，但他的记忆力极好，口齿伶俐，对内蒙古的军事、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历史状况都很了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以说是内蒙古近现代史的“资料篓子”。自到文史馆当馆员之后，他每年都要为省政协提供二、三十万字的文史资料。他拟了一个专题计划，按内蒙古的大事记逐一回忆出来，可惜，因“文革”而没有实现。

李守信在大陆还有两位亲人，一位是他的义子唐成良，此人原是勤务兵，是李守信让师爷教他识字，以后作到内蒙军的校级军官；一位是大太太的姐姐的儿子王治平，他把这个外甥培养到大学毕业，并给娶妻立室。这两个人解放后都先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李守信被特赦之后，先是唐成良从北京跑来，带来了皮褥，皮衣，手表，半导体等东西，并且留下几百元钱做生活费；王治平委托妻子来看李守信，一次给带来几套衬衣，让他每半月换一次。李守信在文史馆，平均每星期收到一个邮包，不是唐成良寄来的挂面、糕点，就是王治平夫妇寄来的苹果、小菜。

1970年5月，李守信老死在江南馆5号小独院里，享年78岁。他患的是心力衰竭并发症，死前没有任何痛苦，只是不思食而嗜睡眠，头枕着枕头便停止了呼吸。在他病危的时候，王治平从北京赶来在他身边。神志清楚时，他表示感谢人民和政府对他的宽恕和关怀，说死后愿同大太太合葬在一起。文史馆为他料理了后事，遗体火化，骨灰由王治平带回北京保存，按死者的遗愿，等两岸统一后带回台湾同他的大太太合葬。

一位大起大落的神奇人物，便这样悄悄地在人间消失了。